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王志民：深耕齐鲁文化沃土

□ 本报记者 卢昱 王佳声



开辟“荒地”，拓展齐鲁文化研究新领域

“1982年初夏的一天下午，当时我在山东大学进修，正好去董治安先生家请教。董先生拿着一份学术会议通知对我说：今年秋天，省哲学史研究会要在淄博召开一次稷下学研讨会，你可以准备一篇论文参加。”王志民回忆，自己很快写出一篇7000字的论文草稿，经董治安先生修改，最终改定题目为《论稷下学宫的政治性质和历史作用》，并在“首届稷下学学术讨论会”上作了重点发言。该文章刊于《齐鲁学刊》1983年第1期，并被收入1984年《中国哲学年鉴》，引起很大反响。这是王志民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也是他研究齐鲁文化的起点。

“近代权威学者一直在对稷下学进行孜孜不倦的探索和考证。清末以来，学术界受西方的影响，兴起了诸子百家研究热，从梁启超到胡适以及当时的学术界，非常关注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里就专门列了稷下通考，考证出当时约有30多位稷下先生，可以说是对齐文化中稷下学的最早探讨。到了郭沫若先生写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把稷下学的研究推进了一步。”王志民厘清了稷下学的学术研究史。

心怀对齐鲁文化的乡土热情，1985年到1986年间，王志民一鼓作气发表了19篇论文，并写出了近30万字的书稿，于1986年底由助教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在刚晋升副教授后，王志民提报了一个省社科重点项目——齐文化概论。深知独木难成林的他，向领导建议需要组建一个研究团队。领导对此十分重视，一路绿灯，1988年5月，淄博师专成立了齐文化研究所。此后学校几经更名，经历了淄博师专、淄博学院、山东理工大学等阶段，当初的齐文化研究所已发展成为硕果累累、人才济济的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

齐文化研究所成立不到一年，学术刊物《文史知识》出版了其首个文化专号——“齐文化专号”。《文史知识》面向全国发行，当时发行量60多万册。这本刊物以“大专家写小文章”而著称，在学术界、社会各界有广泛影响力。“齐文化专号”荟萃了研究齐文化的最新成果，其中有国学大师季羨林、任继愈等大家的文章。“可以说，这个专号第一次把齐文化研究推向全国。”王志民说。

学术研究的基础是大量文献资料的沉淀。从1990年开始，齐文化研究所启动了《齐文化丛书》的编纂。这套丛书包括“文献集成”“资料汇编”“研究专辑”和“人物评传”四编，历时7年完成，共计1100余万字，44种。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集文献、资料、研究为一体的大型齐文化著作集成，是齐文化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今天看这套丛书，它依然是齐文化研究领域的权威、扛鼎之作。”王志民介绍。

“经过这35年发展，齐文化研究院出版了120多部著作，发表了六七百篇论文，院刊《管子学刊》吸引刊登了3000多篇全国学术界研究齐文化的论文，还参与组织召开了十几次全国甚至是国际的学术研讨会。2019

年，以我为首席专家申报的‘稷下学派文献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研究’获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这是山东理工大学获批的第一个教育部重大项目，是齐文化稷下学研究的重大突破。”王志民说。

“齐文化的研究，相比儒学来讲，还是薄弱的。但齐文化的研究与几十年前相比的话，已经有了很大提升、推进、深化和开拓。”王志民说。

儒学只可能产生在齐鲁

“我很早就认识到，齐鲁大地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随着研究的深入，王志民对齐齐文化的认知越来越深刻，并得出结论：“非齐鲁无以生孔子，非齐鲁无以成儒学。儒学只可能产生在齐鲁，孔子、孟子只会诞生于山东。”

王志民说，从文化的内在结构分析，齐鲁文化二元结构特点的形成，既有地理环境差异，也有文化渊源的差异。齐、鲁两国分处泰山北南，地理环境不同，立国方针政策各异，久而久之，社会风俗表现各具特色，主要表现为：齐有尚武之风，鲁有斯文之气；齐俗尚奢侈，鲁俗重俭啬；齐俗长女不嫁，同姓可婚；鲁俗严守周礼，同姓不婚；齐人夸诈放任，鲁人淳朴拘谨。

20世纪以来，通过对齐、鲁故都遗址进行的多次考古挖掘和探查，两座古城的历史面貌基本厘清。从其两城的文化展现来看，也反映齐、鲁文化不同的特色：齐都不断扩建，鲁都变更较少；齐城尽显霸业，鲁城合乎周礼；齐为工商之城，鲁为礼乐之都。

这些表象背后则是齐鲁文化渊源之大不同。齐起炎帝，鲁起黄帝，两者族源不同。“姜太公采取‘因其俗、简其礼’的政策治国，顺应当地东夷文化的风格。周公以周王之弟封鲁，又为周之礼乐文化的创制者，封国后，采取‘变其俗、革其礼’政策以对待当地居民，所以在周之强大文化攻势下，鲁国实际上成为在黄土高原上形成的周文化的东方据点。”王志民说。

齐、鲁的治国理念，亦有不同——齐尚霸道、鲁行王道。“管子说的‘丰国之谓霸’，霸是指要把国家做大做强。所以从姜太公始，提倡‘尊贤尚功’，重用人才，举贤不避卑贱，逐步形成君主强权下的官僚士族政治体制。齐国政治体制催生了田氏代齐的政治变局，田氏新兴政权的出现，则保证了齐国霸业在战国时期的发展、延续。”

王志民说，齐在立国之初，姜太公提出“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奠定了齐国经济重视工商业的基础。春秋时期管仲治齐，进一步实行“四民分业，士农工商”政策，明确职业分工，让工商业能够世代相传。“值得注意的是齐重工商，并未带来其他各业的凋敝，而是呈现农林牧副渔、养马、手工业等百业俱兴的局面，使齐国经济向多元型和开放型发展。”

纵观先秦以迄两汉时代的齐、鲁哲学思想的主流，其差异主要表现在齐尚道学，鲁尊儒学。“‘道’，就是比较看老百姓的态度，按实际情况，老百姓想干什么，主要靠他们决定。大致上说就是那种黄老治国的无为而治，不要太多干涉老百姓。”王志民说，因此，齐国不排斥其他思想的融入，不断吸纳和包容各种思想在齐国存在和发展，形成齐学各种思想多家并存、兼收并蓄的形态，这也沉淀着稷下学宫诞生的思想沃土。

齐统治者稷下学宫筑“高门大屋”，不论哪家哪派的学者，来者欢迎，走者礼送，甚至封官加爵，让其不处理具体政务，专门议论，为我所用。

“稷下学宫的出现，体现了齐文化有容乃大的特质。齐国的整个文化的特性和特质，总体上讲，是为了富国强兵来制定国策，是一种奋发有为、争创一流、崇尚改革创新的文化。还有一个文化特

质是通权达变，通就是通达，权就是权衡利害，全面分析问题进行时适当的改革，这就是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务实求变。”王志民的解释抽丝剥茧。

“当然，争创一流是要争霸。争霸是什么？争老大。这个霸不是说把别人压榨在下面。”王志民说，孔子对齐桓霸业称赞：“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齐国霸业靠会盟诸侯，而非靠兵车武力，是“仁”霸，是以谈判为主，和平崛起，反映了齐人既有称霸之心，又有和平之术。

齐文化哪里去了？

齐鲁虽有大不同，文化的交融却在斗争中愈发紧密。王志民特别指出，孔子周游列国之前先到齐国待了三年，对齐文化的吸收深入而广泛。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孔子因鲁国内乱居齐，此时正是其思想学说形成的关键时期。三年中，他对齐文化进行了全面考察、研究与吸收。在《论语》中，他提及齐国人物与事件的次数仅次于鲁国。孔子正是将齐文化中保留和传承的东夷文化“夷俗仁”及政治霸业中的诸多治国理念吸收、改造、提升，并与鲁文化中制度化、伦理化的“礼”相结合，经融会、提炼、创新，结晶为更高层次的仁、礼结合的思想。

“这既是孔子儒学的核心思想，也是齐、鲁文化交流、融合所产生的质变与飞跃。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探求孔子伟大思想的形成，可以说是齐、鲁文化的融合成就了孔子思想的博大精深，孔子思想是齐、鲁文化二元一体融合发展的结晶。”王志民阐释。

孟子是齐国稷下学宫的领袖人物，他高举孔子思想的大旗，是稷下百家争鸣中最知名的雄辩家；荀子发展传承孔子学说，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待了大约40多年，充分吸收诸子百家思想，成为集大成的伟大儒学思想家。“先秦儒学的形成，是齐文化和鲁文化融合的结晶。儒学在汉代能够登上政治舞台，也与其兼收并蓄诸子百家文化，并纳入自己的体系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常常有人问，齐文化哪里去了？齐文化以新的面貌融入儒家的理念，成了中国文化的主流。这个文化的主流不是顺着孔孟这一条线的，而是顺着齐和鲁的交会融合形成的。”王志民说。

谈到齐文化的现代启示，王志民给出自己的见解：“并不是把齐文化简单移植过来，在新形势下，主要是把齐文化的思想精髓转化成为我们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源。”

“要有奋发有为和争创一流的精神。没有这样一种精神，没有一个坚定目标，那我们就很难前进；再一个就是广泛吸收人才和智慧，多方面吸收学习先进的理念；要适应新的环境和形势的变化，随时调整政策，这个通权达变的精神值得我们今天吸取。”王志民说。

“齐文化还有很重要的理念，那就是对道德建设的重视。比如说以人为本，实际上是齐文化先提出来的。管仲说：‘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我们要想成为强大的国家，应该以人为本，调动人的积极性。齐国重视人的潜在价值挖掘，重视百姓的力量，实行‘四民分业，士农工商’，这是最早让老百姓进行专业化训练的组织形式。”王志民说。

“再一个就是落实各项‘民本’措施，对老百姓要‘爱之、利之、益之、安之’。这种以人为本思想的提升，也反映在孔孟所创立发展的儒家思想体系中。孔子将‘人本’提升为‘仁’的思想内核。孔子的仁学，内涵丰富，主要有两个层面：爱人与修己。他提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提出‘克己复礼为仁’，将仁与礼结合，构成思想体系的核心，并提出“孝悌”“文行忠信”“温良恭俭让”等一系列伦理道德规范。孟子一方面将孔子‘仁’的

思想与政治紧密结合，大力推行‘仁政’主张，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论断，将民本思想提升到历史的新高度。”王志民剖析。

在齐文化所倡导的道德建设里，最重要的是什么？王志民给出答案：在管仲时期提出来，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这个礼义廉耻四大方面，是国家建设的四大纲领。如果将国家比喻成大的建筑物，这就是四个支撑柱子，这也成为儒家的核心思想。”

“礼是什么？就是秩序。管仲时期的改革，并不是说开放就忘了规矩，不是不要制度、政策。这个礼有很多道德理念在里面，比如相互尊重。我们今天讲‘好客山东’，其中就有礼的因素在里面。”王志民说。

“义是什么？就是公正、正义。什么叫廉？有三个含义：一是‘清’，就是清正，两袖清风，不贪不沾；二是‘慎’，谨慎，慎重，慎重用权，不滥用权力；三是‘勤’，就是勤奋，在其位、勤其政，奋发有为。廉和耻，往往结合在一起，称为‘廉耻’。所谓耻，就是知耻。你知道哪一些是耻辱的，是不能做的。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你知道哪一些是羞耻的、让人厌恶的，则有所不为。”王志民解释。

除了以上四维，齐国的诚信文化亦源远流长。“管子提出‘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诚信是统治天下的关键，要让天下很和顺、通畅，那就得讲诚信。诚信指的是一个人的修养。对人要真实、真诚。你只有真，才能讲信用。信，是指人和人的关系，就是交往之间说话算数。诚和信结合起来就是说，你先做一个诚实的人，才能够跟人们的交往当中得到信。”王志民说。

“注重每个人修养的问题，要做到诚，然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要讲信。从这样来看，齐文化既注重物质文明建设，又注重精神文明建设；既注重生产力的发展，还注重文化的提高。从这样角度讲的话，我们要从齐文化当中吸收丰富的思想营养。”王志民说。

推动稷下学宫走向世界

王志民的学术研究具有创新性、开拓性，其中对稷下学宫世界文明史地位的研究和论证独树一帜。经过数年的考古工作，今淄博市临淄区的齐故城小城西门外建筑基址群，被基本认定为稷下学宫遗址。“那里有像大礼堂的地方，有教学、研讨的场所。可以说，这次考古成果既合乎历史记载，又合乎考古挖掘的实际，破解了思想史、学术史上一个很大的谜团。它对于稷下学宫和百家争鸣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王志民说。

“如果把稷下学宫放在世界文明史的层面上来看的话，它的意义就更大。”王志民说，在世界文明史上，或者说在世界教育史研究上，有些西方学者提出希腊的柏拉图学园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大学，他们认为希腊文明是高度发达的。长期以来，西方学者主导了这一话语权，即世界文明欧洲中心说，认为欧洲的文明影响了整个世界。而稷下学宫的考古项目获得重大突破，打破了这种世界文明欧洲中心说的观点。

2017年10月，王志民曾专程到希腊柏拉图学园考察，在那里看到广场地下有建筑遗址，旁边还竖着柏拉图的雕像。跟稷下学宫的遗址相比，柏拉图学园要小得多。现在考古发现的稷下学宫遗址，规模更大，更加恢宏，这就坐实了世界文明史上最早的这两所大学和学术文化中心的存在。随后，王志民访问了雅典大学，并与雅典大学哲学院院长海伦教授达成协议。

最终，2018年9月在稷下学宫所在地临淄，王志民邀请了雅典大学和希腊六所大学的15名学者，以及20余名研究稷下学宫和希腊文化的中国学者，召开了“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高峰论坛”，两国学者对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在世界文明史上相似的地位和贡献等进行了比较，并出版了《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比较研究论集》一书。

“我们就是要着力推动稷下学宫这颗中国文明明珠，走进欧洲的心脏地带，走向世界，真正让大家了解东方文明辉煌、很伟大。特别是在轴心时代，出现了像孔子、孟子、墨子、孙子等世界文明史上的伟大人物。他们不是偶然出现的，是有一定文化底蕴的，这是我们的文明孕育的。稷下学宫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也是文化发展的必然。以稷下学宫为理念的诸子百家争鸣，奠定了秦汉大一统的理论基础。”王志民说。

对于下一步的研究计划，王志民给出数个方向。“一个就是稷下学的研究。我们‘稷下学派文献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研究’这个重大攻关项目，到2024年年底按期完成，将会有5本研究专著，现在有200万字资料汇编，将来要有100多万次的文献整理，还要建一个稷下学的数据库。”王志民说，“还有对齐国历史的研究，现在启动了齐国通史的编纂，由我牵头，准备两年内完成。”

“后面，我们还要跟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化遗产研究院合作，加大对齐国考古遗址、地下文献文物的结合研究，这也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另外，我个人的设想和建议是，要聚焦经典著作《管子》的深入研究，挖掘齐文化中的现代价值。”王志民说，“齐文化研究，道路越走越宽，未来的成果会很丰硕，齐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也会取得比较满意的成绩。”